

· 史学评论 ·

## 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述评\*

史敏

[摘要] 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以探讨中国现代女性的历史主体特性为航舵,聚焦那些作用于现代女性身体的政治话语策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机制等身体权力技术。它历史性地呈现出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生成进程的同时,通过在宏观的国家、阶层、经济等结构性框架下,实现对社会话语微权力,及相应权力机制的形成、运行及功能的微观分析,实现对整体史更精微、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方兴未艾,在汲取西方新文化史、性别史、女性身体史等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的同时,对本土化的身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有探索和创新。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在对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的深入研究中得到解决。

[关键词] 女性身体史;新文化史;话语分析;身体政治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7)02-0102-10

当下,“身体”在中外学界已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思想主题。史学研究领域中的“身体”就是“事件”,其根本属性是“生成”。换言之,“身体”乃历史性地“生成”,身体史研究就是要在在线性的时间逻辑中,呈现出历史语境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相应权力机制的配合下,对身体的形塑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切身体验,在此维度中实现更精微、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历史。这里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的支配性话语。源起于此的权力,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不同,后者在意念上虽以个体为基点,但实际运行逻辑却是宏观结构性的,相较之下,前者则是“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sup>①</sup>,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它直接作用于现代个体“身体”,发挥出对现代个体主体既驯化又生成的双重功效,架构起现代“身体政治”的主体运行逻辑。

身体史研究内含了一核心“潜”维度,即探究现代人既遵循理性而驯化自律,又不违背自身情感意愿而超越自我的个体主体特性。该“潜”维度基本上定格了身体史叙事的“情节化模式”<sup>②</sup>;聚焦作用于现代身体的政治话语策略及相应的社会机制等身体权力技术,分析其中理性与非理性元素的融合与互构。同样着眼于权力,女性史是在“性别”视角下,对造成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sup>③</sup>进行历史性审视。除对权力敏感外,身体史和女性史还都关切并预设研究对象的历史主体性。基于相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身体史和女性史在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致同期兴起后,就极具亲缘性地迅速聚合在一起,女性身体史由此萌生、发展起来。时至今日,现代女性身体史俨然已成为史学研究中新取向和新问题的高产线,学术前景乐观。相较于西方,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是在新世纪前后,现将研究状况做一述评,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 现代女性身体史的哲学、史学来路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新文化史风潮的兴起,对西方女性史快速引入身体史分析范畴,发挥了

\*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成果。

① 林·亨特著,姜进译:《新文化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② 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海登·怀特提出此概念是想表明,在历史叙事中,采用某一特定的情节化诠释方式,历史事件就会随之展现为特定类型的故事,由此确定了该历史故事的“意义”。

③ 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佩吉·麦克拉克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至关重要的学术催化功效。余新忠对中国医疗身体史作过拓荒性研究<sup>①</sup>，他较为清晰地表述出了新文化史的内涵：“新文化史希望通过对文化的自主性的强调和对意义的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sup>②</sup>可见，新文化史是将历史个体主体作为逻辑基点，主要采用分析社会主流话语的方法，而非传统的对政治、经济因素的结构性的拆分；取径阐释文化意义，而非探究因果的研究方向，以使“情感”摆脱相对于“理性”、“女性”相对于“男性”的附属地位。

当我们提升视野，越过新文化史，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脉络时，发现女性史对身体史分析范畴的吸纳绝非偶然，而是受到了20世纪西方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所致。存在主义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为代表，主张人的本质是其在现世中存在的特性，并依此提出人具有历史有限性，强调适度理性，同时推崇情感的价值，指出它既是人之现世意义的归依，又是超越自我的动力。法国女性存在主义学者波伏娃，在1949年推出了第一部存在主义风格的女性史著作——《第二性》。在书中，波伏娃以女性的生物性身体为论述起点，以超越生物性身体决定论为论证目标，提出了今人颇为熟稔的灼见：女人非天生，而是后天由文化建构生成。伫立于今天的视点回望，《第二性》对女性生物性身体和对悬置女性身体的文化网格的双重思考，首次构建出了女性身体同文化间的直接联系，成为了后世女性身体史的学理原点。

后来女性身体史中的“身体”意涵，纯粹生物性的所指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话语/文化权力的能指大大增强。对此意涵转换，法国学者福柯起到了关键的转捩作用。福柯对“身体”展开了一番颇具开拓性的哲学和历史思考，他的《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等经典著作，都集中从“身体”维度剖析出了现代人的主体性特征：会遭遇社会话语/文化微权力的训育；将针对身体的权力技术内化成自我技术，生成自律身体；基于人性道义，可能会遵从身体感受和情感意愿，超越自我存在状态。汪民安把上述福柯对现代人主体性模式的思考，分别概括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sup>③</sup>。孤立地审视福柯的身体史研究，我们或许无从深刻领会其中思想理论的重大原创价值，唯有把它放置于现代性主体内涵的演化轨迹当中，才会理解它的里程碑意义。

人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迄今主要历经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理性独大；后来转变为在坚持理性必要性的前提下，认同非理性情感同样不可或缺。换言之，在下一阶段，先前单一的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情感要素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考量人之主体的双重维度。法国人笛卡尔作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以“我思故我在”的宣言，成为了高擎现代“理性”的旗手，引领世人将宗教性的价值信仰赶下了神坛。此后，随着现代性世俗化进程的高歌猛进，终极信仰加速衰弱，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祛魅”的快车道。与宗教信仰的“祛魅”进程相逆而行的是，情感逐渐占据了终极道德信仰弱化后腾退出来的位置，不仅助益了世人理解理性思想和行为，甚至自身就是理性的目的。基于此，现代情感具有了正当合理性。而感受和表达情感的身体，通过“情感”媒介，与理性紧密勾联起来，同样具有了正当合理性，并据此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现代性思想主题。上述理性—情感—身体间的逻辑关系，在福柯的身体史思考中表现鲜明：理性的话语(知识)/文化权力先影响到人的情感层面，经其传导施加至身体上，身体要么完全屈从权力，要么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权力。质言之，现代情感与理性是负载现代身体政治前行的两个车轮。由此，人的现代性主体中理性的有限性和感性的超越性双重特征并行不悖。

透过带有政治属性的现代情感，我们发现，经由这一媒介后，“身体”很大程度上与人的现代主体

① 2002年，余新忠完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获评当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3年，该论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余新忠：《导论：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③ 汪民安：《如何塑造主体》，福柯著，汪民安编：《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Ⅸ页。

性具有了“同质性”<sup>①</sup>。总览当今“身体转向”潮流,无论是学界研究,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切体验,都是沿着“情感”路径一路走来,且越走越宽。究其根源,情感拓展了现代性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深入普泛化路径。因为当与情感密切相关的身体成为我们认知现代人主体的维度后,就会有效碾平单一理性维度所拉开的个体间差距,顺应社会向个体化发展的趋势。简言之,当前社会“一个庞大的身体论域得以形成”<sup>②</sup>,既是现代性深入推进的内在动力,也是外在呈现。敏于“身体转向”潮流,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1990年将话语/文化政治微权力的分析方法,明确引进女性研究领域。她指出,女性主体生成既是身体“受规则所支配的话语的一个结果”,又由此“被赋予一种能动性”<sup>③</sup>完成自我建构。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暗合了新文化史话语/权力的历史分析方法,有力推进了女性身体史研究的发展、壮大。

以上述哲学、史学理论发展为基础,在新文化史的粘合下,女性史和身体史糅合形成了女性身体史。其研究实践自觉秉持了女性主义理念,围绕问题意识展开:即破解出“同时间相联系的身体感觉”和身体生成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剖析出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性的身体原因”<sup>④</sup>和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原因。显见,女性身体史实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这就要求研究者需秉承陈寅恪先生“著述唯剩颂红妆”的专注和专业精神,唯此才能真正实现对既往男权主导下的历史研究及书写的校正。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女性身体史研究发展迅猛,直冲至“新文化史研究的最前线”<sup>⑤</sup>。这其中包括了一批身体史格调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作品,主要代表作有:伊沛霞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1993)、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曼素恩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1997)、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1997)、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997)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汉学家们依旧热情高涨地推出了一系列中国女性身体史新作,主要代表作是:高彦颐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2005)、曼素恩的《张门才女》(2007)、季家珍的《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2008)、卢苇箐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2008)等。以上所列著作,在叙事手法和分析诠释上都明显呈现出了共通性:预设女性为历史主体;关注历史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历史处境的建构;揭示该历史处境对女性身体的铭刻和形塑。我们显著感到,美国的女性史研究真正完成了脱离专门史、向整体史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得以完成,不能不说引入身体史分析范畴至关重要。

美国女性身体史研究快速发展、繁荣起来绝非偶然,这与美国较早形成较完备的“性别史”,或是“女性史”的学术生态息息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琼·W·斯科特就提出把“性别”作为一个有效历史分析范畴的观点。她主张,“性别”应与“阶级”和“种族”一样<sup>⑥</sup>,成为理解社会历史的轴心。不难看出,斯科特提出将“性别”历史分析范畴独立化的同时,实际也暗示出了一个必要条件:女性史唯有对社会权力结构进行深刻剖析,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普遍史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在斯科特观念引领下,美国的女性史研究者基本上都自觉地接受了身体史中的个体主体意识,以及社会话语/文化微权力的分析方法,在研究实践中接近、实现了女性普遍史、整体史的学术构想。

进入新世纪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影响到了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一学术潮流推动下,中国大陆女性身体史研究才得以真正展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本土女性身体史研究的展开,虽直接受益于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但绝非完全把它从西方照搬过来,而是汲取其精髓,嫁接在中国女性史自身的学术脉络根基之上,形成了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和趋向。

① 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 余泽梅:《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6期,第19页。

③ 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7、189页。

④ 克里斯蒂安娜·艾费特:《性别史》,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⑤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⑥ 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第168页。

## 二 中国大陆妇女史和女性史不同的身体研究

中国女性身体史的兴起、壮大,是中国女性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后的再深入。中国女性史承续、折转妇女史而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史学的强劲风气之中,社会史初兴,在这一范畴内,妇女史研究起步。直至民国结束,此期间的妇女史研究,基本上是对“妇女解放”这一时代标签的展开。深层次来看,民国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努力冲破父权束缚的“男性解放”这一时代命题的背书。这深刻折射出了民国时期,性别间合谋、聚成合力的早期历史样态。这一新的性别关系生成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政治实践,内在地要求全体国民投身其中。为此,国家多方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中去追求前程、获取自身利益,就成了应有之义。陈东原于1928年著成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奠定了民国妇女史“压迫—解放”的主体逻辑架构。抗战胜利,国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最终形成,父权彻底瓦解,但微妙的是,男性夫权却随之有所强化。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新中国真正全面实现了对妇女的社会动员,男性强势的夫权才明显趋于弱化。此后,由于没有了民族—国家和性别平等的双重动因,中国妇女史研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归于沉寂。

自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视域在中国浮出,并快速占据支配地位。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史再度复兴,在其范畴内,建国后长期中断的妇女史研究得以恢复和接续发展。在这一轮妇女史研究初期,研究者虽多采用现代化视角,但也多惯性地国家—阶级的结构性框架中,呈现出女性群体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而鲜有偏重于个体关切的女性身体史研究。进入90年代后,随着现代化的线性进化史观逐渐过渡到现代性辩证、复杂的进化史观,妇女史研究中的国家—阶级结构性框架受到了较大冲击。研究者转换视角,从个体层面再审视“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目标,觉察到有形式化和抽象感之嫌,亟待细微和感性层面展开研究。随着过渡的深入推进,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首次显现出了与男权话语疏离的倾向,为凸显出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称谓更名为女性史。历史学者罗苏文于1996年推出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凭借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成为中国大陆女性史研究的先锋之作。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此期间的女性史研究中,宏大的结构性叙事格调依旧清晰可寻,对于女性个体的历史关照仍“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sup>①</sup>。

伴随着中国大陆妇女史向女性史的过渡,聚焦于女性缠足的身体史研究最先有所发展。主要代表论著有:樊心、元曙冬的《近代妇女解放的先声:浅谈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1983),吕美颐的《晚清不缠足运动述略》(1985),闵杰的《戊戌维新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区域、组织和措施》(1993),邱瑞中的《中国妇女缠足考》(1993),梁景时的《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始末》(1995),夏晓红的《清末的不缠足与女学堂》(1995),李凤飞、暴鸿昌的《中国妇女缠足与反缠足的历史考察》(1997),高世瑜的《缠足再议》(1999),杨兴梅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1998)、《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2000),以及高洪兴的《缠足史》(1995)专著等。纵观上述围绕女性缠足展开的论述,逻辑上依旧是陈东原式的“压迫—解放”模式,更确切地说,是对民国史学家贾逸君1925年著文《中华妇女缠足考》的补充延展。着眼于内部,我们观察到上述论著依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前期探源古代女性缠足的具体缘由和历史演化状况;中期关注近代戊戌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政治变革节点,对现代女性不缠足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期主要集中讨论现代性政治体制权力,诸如女学、政府公告、决议及相应社会性举措等,以及对现代女性天足的制度性保障作用。简言之,上述论著整体力求通过破解女性废缠足的现代文化意义,折射出近现代中国追求民族解放、文明进步的理性历史样态。对比来看,后期研究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中期宏大结构性历史叙事化约主义的不足,但从女性史角度看,女性历史主体地位依旧偏弱,妇女—女性史的转型没有真正完成。换言之,在妇女史逻辑框架下,对缠足这一局部身体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并不构成真正的身体史思维,后期研究仍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结构性历史叙事惯性的强力牵引,根本为前期模式的延续而已。这一状态受到了新文化史冲击后,才真正有所改观。

<sup>①</sup> 李小江等:《中国女人:跨文化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0世纪90年代末新文化史进入中国。准确来说是1999年,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访华,直接引起了国内历史学者对新文化史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后,新文化史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女性身体史研究的影响真正展现出来。其最明显的变化是,女性身体史与现代民族—国家主义间的强势关联有所斜展、松动,显示出从宏大的现代性视角,向精微、感性的后现代视角转换的学术趣味。杨兴梅在进入新世纪后写作的数篇文章,在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无不体现出了新文化史格调。其主要包括:《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缠足的野蛮化:博览会刺激下的观念转变》《贵贱有别:晚清反缠足运动的内在紧张》,以及她在2012年出版的《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一书。上述诸文都围绕中国现代女性天足与缠足的不同身体情状,呈现了现代美、丑审美观的对立与博弈;分析了现代女性身体政治中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境况;对比了知识、权力同社会地位尊卑相异女性的不同互动状况及结果,颇有创新意义。同期类似风格的文章,还有李叔君的《从习性到习俗:缠足女性的身体博弈》《女性身体与权力渗透:缠足在话语中的历史呈现》,苏翎平的《缠足/放足:男性话语霸权运作的场域》,刘永春的《缠足:从审美到道德的嬗变》,秦方的《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等。这些文章对于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的运用,虽在娴熟度上不及杨兴梅的论著,但却无疑强化了我们对于学界趣味转换的感受。总体来看,碍于新文化史、女性主义、身体社会理论、美学意识形态等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易短时间内被全面、透彻把握,故研究依然围绕女性的局部身体(如缠足)展开,对现代女性整体身体及其背后文化/权力的深入挖掘和细腻分析明显不足。

相较之下,台湾较早开展了女性身体整体研究,发展较为成熟。台湾史学界受西方新文化史影响较深,在女性身体史研究中较早走上了文化建构、话语权力分析的研究路径。黄金麟是“在中文学界里最明确标举身体史大旗并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的学者”<sup>①</sup>,他在近10年间接连出版了三部质量上乘的身体史研究著作<sup>②</sup>,逐层揭示了中国现代身体的三个历史面相:身体政治的“国家化”;个体主体在身体层面上对社会权力意志、结构的冲击和反抗;社会体制“生产人”,此类“人”能够下意识地复制社会体制,也可能不时有意识地去突破它。贯穿于黄金麟三部身体史著作的思想主轴是,他对个体身体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脉络:起初研判现代性“主导着身体的发展和价值评量”<sup>③</sup>,后来调整成身体与现代性为共生和互制关系。不难看出,黄金麟对现代身体所承载的“复杂与矛盾”的现代性思考,理解与把握得越来越细致和精准。黄金麟对身体现代性文化意义的深入诠释,深刻影响到了台湾女性身体史研究。2009年,台湾女性学者游鉴明推出的《超越性别身体》一书就颇有代表性,书中以中国现代女子体育发展为主线,历史性地呈现了学校、新闻媒体、广告、社会舆论等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的话语/文化微权力,对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控制性生成功能。尤为深刻的是,游鉴明非常注重从身体审美层面历史性地关切现代女性的“生命和生活”<sup>④</sup>。笔者以为,历史性地考察身体审美正是女性身体史较之一般身体史的鲜明特点。需要注意的是,台湾身体史,包括女性身体史在内,追赶西方身体史与之同质化的努力,虽不乏学术开拓意义,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中国现代身体“在地化”特征的研究不足,从而损伤了自身阐释身体的文化意义及生成机制的精准性和深刻度。

中国大陆新文化史格调的身体史研究虽比台湾晚了近十年,但大陆学者汲取西方新文化史和身体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十分注重历史性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机制架构,是如何被现代性话语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功能,又怎样辅助现代性话语/文化权力及相应机制生成现代性身体。也就是说,大陆学者进行身体史研究,“身体”的中国文化特性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量。在这方面,杨念群所作的身体史研究较为突出。他在2006年推出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

① 刘宗灵:《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第89页。

② 黄金麟的三部身体史著作分别是:《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此书曾于2006年在大陆出版);《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版;《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1895—200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

③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自序》,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④ 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985)》一书中,由中医话语牵引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通过西医话语牵引出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两套话语的博弈中,诠释出了中国现代身体生成的多重因素和复杂样态,进而揭示出“历史生活的复杂面相”<sup>①</sup>。

身体史中注重“在地化”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身体空间的敏感。现代性空间是新文化史的重要主题,它在身体史研究中体现为对特定空间内现代大众身体日常基本生活模式的关切和理解。其理论根基,可溯源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以对人之本质是在现世中存在的研判,碾平了心灵与肉体间的鸿沟,对大众的身体体验赋予了研究价值和意义,从而彻底把“大众日常平凡的经验世界”<sup>②</sup>严肃化和意义化。身体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当程度上正是基源于此。在中国大陆的女性史著作中,有身体史趣味,同时又带有“在地化”风格的著作,是姚菲于2010年推出的《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一书,历史性地关照到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现代女性身体既有“脱域化”<sup>③</sup>的现代性特性,又浸润并展现出了上海地域文化的底蕴。

女性身体史研究虽依赖于微权力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但终究离不开结构性的分析和把握。也就是说,唯有将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置于宏观的国家、阶层、经济等结构性框架中,实现对社会权力机制的形成、运行及功能的微观分析,才能真正细腻、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住中国社会和人的传统—现代转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如林·亨特在揭橥新文化史大旗十年后,折节高举“超越文化转向”的标识,力倡要把微权力与社会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以突破此前可能存在的将“一切都囊括到文化之下,结果是什么都解释不清”<sup>④</sup>的诠释力不足问题。女性身体史作为新文化史和女性史的新兴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兴起,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史学界对文化具有独立历史审视功能的某种认可。但我们也要警惕,女性身体史研究如若完全脱离了宏观的结构性史学分析范畴,便不能成立,因为游离于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之外的鸡零狗碎是没有史学意义的。确切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女性身体史研究展开的基础性方法和分析框架,因为没有前者,后者就不可真正理解。

当然,话语/文化视角自有其精妙之处,文化自身的等级性以及等级间的流动性,会凸显出不同阶层女性身体的差异性,也会体现出阶层转换对女性个体身体的蜕变功能。这无疑内含着女性身体史研究必须是精敏、细致的,而决非粗糙的轮廓性勾画。否则,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就是形似而神离了。总言之,女性身体史作为一种普遍史而非专门史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应用社会话语/文化权力分析范式,对微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剖析,有效地弥补了之前历史研究注重宏观国家—社会权力机制,疏忽内生于社会支配性话语(文化)权力的不足。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以深入剖析两种权力的有机融合及运行机制为研究旨趣,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对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而且对当代女性理性地认知和把握自我,同时又富于激情地面对和拥抱生活理念的形塑,具有重要历史和理论意义。

### 三 新世纪新文化史格调的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起步

新世纪以来,“身体”研究特别激发了年轻学者的学术热情,相关论题的博士论文呈快速增长之势。迄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身体”命名的博士论文共计118篇,其中关涉到中国近现代身体的有8篇,这当中有3篇论文是针对女性身体展开的研究。3篇论文中有两篇属于文艺学:一篇是段祯的《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2007);另一篇是程亚丽的《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叙事》(2007)。这两篇论文都将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生成分成国家化阶段和个体化阶段。国家化阶段是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变革、革命等社会主导话语权力的支配,向理性化层面生成的阶段;个体化阶段是女性受到了男女交际、生养抚育、服饰装扮、体态动作等新话语的形塑,向个体化层面生成的阶段。也许这两篇论文均属于文艺学的缘故,都不曾对话语权力的社会

① 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② 威廉·巴雷特,段德智译:《非理性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③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1938— )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脱域机制”是现代性全球扩展的动力之一,该机制将现代性从特定的地域情境中提取出来,以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组织现代性的社会关系。

④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第191页。

体制结构及效用情况有所涉及,也没有对宏观与微观的社会权力和体制间的互构进行历史性探讨与呈现。这势必导致解释不力,使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生成缺乏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也就是说,只有各个话语的孤立分析,没有对话语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相互独立且又相对转化的共生性思考,再加之没有对话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体制层面运行实践的剖析,无法整体上把握住中国女性身体的现代性特征。

三篇论文中真正属于历史学的论文是曾繁花的《晚清女性身体问题研究:基于若干报刊的考察》(2011)。该文更像是从女性身体医疗史向女性身体史的过渡,涵盖了女性足部、面部、生理、生育、医疗、健美等内容,呈现了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如是状,却没有阐释出为何如是。其根源是,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生成缺乏话语/权力的思考和分析。实际上,围绕中国现代女性身体有一套话语体系,其中每一分支话语,都建构了现代女性身体的某一种面相,且在建构进程中往往表现出将该面相引至极致的倾向,于是整套话语体系内部就有平衡彼此的必要,而这种平衡的本质即为政治属性。但显然,论者在其讨论中,对现代权力运作机制的批判意识以及“反对压迫和控制的、道德倾向”<sup>①</sup>都不足,致使对现代身体政治中话语/文化权力的深刻剖析和呈现层面有所欠缺。

除此之外,当前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主要还有以下问题和特征。

首先,身体概念莫衷一是、含混不清,由此导致了女性身体史研究问题意识不明晰。刘宗灵曾指出,黄金麟在其著作中不仅“始终未给所讨论的‘身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且在讨论中又“不断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以至于‘身体’这个概念的外延内涵均较模糊,范围显得太宽,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感觉”<sup>②</sup>。其实,这一状况在当下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中也较为普遍。“身体”被预设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实际论述中则充斥了各种对“身体”概念意涵的隐喻性理解和象征性话语诠释。究其缘由,主要归于身体史研究“对感觉的沉迷很容易流于一种表面的体验”,易于对身体产生“多元解释”且“越来越趋于分散”<sup>③</sup>。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根据‘身体’出现的语境来判断身体”<sup>④</sup>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一个规范的“身体”概念意涵下,历史性地展开研究。库恩说,一个学科唯有大家普遍遵守的规范才算成熟。身体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的学术共通性和整体性是十分必要的。笔者以为,“身体”是以生理为基础的存在,身体史中的“身体”等同于历史性的“身体生成”,身体史就是要呈现出身体生成的历史性历程,以此否定人的本质性。在身体生成的历史书写中,必定会涉及到身体感受和社会体制两个层面,将其整合的关键在于,把话语/文化微权力的细腻张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内理动因有机结合起来。唯此,才能把持住身体的历史“真相”与文化“意义”的并行不悖,也才能找寻到身体的生物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平衡,进而合理、有效地理解和诠释身体。

其次,身体史研究对理论预设的依赖性较强,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理论学养要求。身体史研究专注于对身体意义的“深描”<sup>⑤</sup>,是对历史化约性研究的反动,但倘若研究者不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就很容易导致身体史书写“被叙述的细节湮没”<sup>⑥</sup>。彼得·伯克高度重视以理论为支撑的“预先判断”在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之一”<sup>⑦</sup>。不夸张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所应用的理论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西方现代身体理论肇始于笛卡尔,历经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布迪厄、吉尔斯等诸多思想家,接续传承和发展了现代性主体范畴中的“身体”这一重要命题。鉴于中国本土现代身体理论的匮乏,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国身体“中层理论”<sup>⑧</sup>的设想,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具体内容予以充实。在笔者看来,中国本土现代身体理论的发展方向应不外乎是:中国传统身体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与流变;中国现代性话

① 姜进:《新文化史·总序》,林·亨特:《新文化史》,第7页。

② 刘宗灵:《重读近代中国:身体史的另类视角》,《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9页。

③ 杨念群:《中国艺术表达中的“隐喻”传统与历史写作》,《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43页。

④ 李蓉编著:《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⑤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⑥ 休厄尔著,朱联璧、费滢译:《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⑦ 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2页。

⑧ 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年第2期,第10页。

语/文化与之共谋生成了中国现代性身体。基本上可以确定,现代女性身体史属于历史学科中极具理论化的分支,社会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都渗入了其中,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再次,在身体史研究中,无论“身体”上的思想文化意义有多强,都不可忽视其生物性基础。身体是人生命的本源与象征,这使得身体史研究初期多从医疗史开始,中外概莫能外。彼得·伯克曾就此发论,“身体史最早是从医疗史中发展出来的”<sup>①</sup>。女性身体史的研究发展路径亦然。美国学者费侠莉在1999年推出的中医妇科身体史《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一书可谓明证。笔者以为,身体史研究初期多结出身体医疗史成果的学术现象,显示出人体生物性要素在身体史中的不可逾越性。故此,女性静态的形体、线条、服饰色彩等形式因素,动态的举止、运动、风姿等气韵表现,都应属于女性身体史研究者的观察内容。当然,身体并不完全是生物性构成,其背后是社会文化及体制的强力介入,它们对身体的雕凿力是决定性的。

最后,身体史研究的价值关切是关照普通个体的历史生命样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意识。随着现代性的深入推进,个体性主体愈来愈多地泛化在身体层面。究其缘由,“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为人的感性存在及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sup>②</sup>。也就是说,理性的“我思”虽通过“我在”已认同且统摄了身体的感知和感性,但现如今,人类生命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空前凸显出了身体感知与感性情感的思想文化意义。质言之,感性情感与身体感知同理性一样,对于生成人的现代性主体都不可或缺。身体的情感体验,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论,本质上就是审美体验。而现代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即是把理性“权力的结构”变成“情感的结构”,并外显为“向感性身体的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以细腻的限制性法则来雕凿身体”<sup>③</sup>。

#### 四 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今后的研究走向

英国当代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学家从社会学或哲学中,引进某些理论或模式对历史进行有效分析时,历史研究才不再是“不需要用脑而以收集琐事为能事”的“软性的思考”,走上了“需要智力的道路”<sup>④</sup>。笔者理解,霍氏对历史学发展方向的睿判既可当做是对女性身体史兴起、发展的溯源性说明,也是对今后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深入下去的条件预设:研究者务必格外留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走向,尤其是要对(知识)话语/文化的微权力分析方法吃深、吃透,不断完善、提升自身梳理、叙事和分析、诠释的研究能力。

鉴于当前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多着眼于权力(国家理性)身体阶段,今后应加强对中国现代女性知识身体和伦理(自我支配)身体的历史性呈现与剖析。在后者研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目前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权力(国家理性)身体的处理方式是,基本上都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及其政治实践,设定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女性身体的种种现代性面相,都能溯源至此。后果是,当一个筐囊括了太多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存在”源头的时候,其解释力也就同时被极大地削弱了。究其原因,研究者忽略了对女性知识身体层面的追溯与挖掘,在讨论权力(国家理性)身体之前,没有进行相应知识话语的探源及其流变的历史性呈现,从而无从把握现代女性身体生成的初始动因。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知识、话语缘起,可追溯至19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已从上帝的神圣意念降格为世俗性的自然法意识形态,经过19世纪末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进化论思想的洗礼和渗透,自然法与进化论两相融合,催生了中国现代人权和女权观念。可知,关涉到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生成的“女权”概念,是女版自然权利的最早现代用语,进化论则强化了该权利的主动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以女权相号召,中国现代女性权力(国家理性)身体开始生成之时,实际是女性知识身体向权力身体的集中转化。而自然法、进化论、人权、女权等概念中的原有西方文化基因,是如何在中国社会语境中衍生出独特内涵,又怎样建构了

① 彼得·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第73页。

② 刘清平:《时尚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美学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9、30页。

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论历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中国现代女性的知识身体,对上述问题的梳理、分析和回答,会是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除知识身体外,既有研究也基本没有关照到中国现代女性的伦理身体层面。伦理身体是指自我身体的支配技术,根本上是知识身体和权力身体的内化。换言之,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及权力、秩序对女性身体的支配、生成功能,通常只有转化为女性个体的自我身体技术才能发挥作用。而对中国现代女性的伦理身体展开研究,很大程度上又是从身体美学角度探讨现代女性的主体特征。现代女性的自我身体技术首要表现为自我关注,并通常引发自我过度膨胀。对此,目前鲜有研究者展开系统研究。个别有所涉及者,还是多遵循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突出国家、社会责任等道德理性意识来压制女性个体情感<sup>①</sup>。事实上,现代女性自我身体技术中的情感要素,倘若专指爱国情感而个人情感缺位,那么在逻辑上不仅与现代女性恋爱、婚姻情感相矛盾,更会导致现代女性的个体主体无处寻觅。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把握好现代情感与理性间的融合、互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不追求独立性存在,“情感与(道德)理性在本源上相联结,追求其交融统一”<sup>②</sup>。而现代理性却是本体性存在,它在自身获得了独立的同时,也使情感挣脱了往日道德理性的束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空间。质言之,现代情感本身就是现代女性身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审美观及相应机制就根基于此,其核心是将文明理性与爱国、爱他人、爱自己的情意感性有机地交织融合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说,现代审美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女性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且与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秩序高度一致。

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绕不开对“身体”的美学思考。因为在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理性身体生成的同时,现代审美理念、话语也同时渗入和纠缠在其中,不仅有力地证明理性身体生成的合理性,还成为其存在的目的。而目前有关于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笔者看来,阐释出中国现代情感从传统道德束缚下获得前所未有的相对独立,同时又与现代理性交织共同发挥身体生成功能,既是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的最显著特性,也是其要突破的关键环节。可乐观地预见,清晰地梳理出现代女性身体集现代理性与现代感性于一身的历史思想文化演变脉络,既会是中国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的突破口,也应是其高产线。

中国现代女性身体既具理性,又具情意感性的双重特性,是由中国现代理性与感性的话语合谋生成。稍作展开就是,继严复携“天演论”(1898)在中国开启了理性启蒙后,蔡元培借“美育”(1901)发动了现代感性启蒙。梁启超的“新民说”不仅汲取了进化论的理性思想,同时也接受了知、情、意分立的感性思维理路影响,将“爱”(国)之情感视作国之“新民”的必备精神情感。随着新民说的广泛传播,梁启超理性的“力本论”和感性的“爱群”之情同时被国人所熟知。于是,情感开始从儒家道德的捆束下挣脱出来,与理性一同进化且两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了一起,进而有力地吧挽救民族危亡摆正在国人心中。在清末民初,理性与情感融合的时代语境中,饱含此意义的现代“人格”概念盛行,有力推进了现代女性身体生成。女学兴起后,人格教育主导了女学的修身课程,意在使女学生意识到闺阁之外有更大的文化和环境,推动她们积极投身其中,把握住自身的命运和前程。女学中的人格教育“首在体育”,历史性地张扬出女学生的身体,使其成为力与美的统一体。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话语的剧烈代际转换,女性情意身体的审美呈现出了个性化特征。特别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后,科学理性虽占据上风,玄学日益沉入劣势,但是有关女性情感的话语却与科学理性同步增长,并转化为对女性身体的有效辩护。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美学大爆发,女性情意感性身体真正实现了普泛化,与此同时女性身体政治也空前强化。

当我们进一步思索女性身体审美的标准时,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他提出不能将美丑简单对立,而是要更多地去权衡“社会或政治标准”<sup>③</sup>。换言之,艾柯主张身体的审美意

① 段炜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三节,对中国现代女性情感层面有所涉及。

② 李泽厚:《说文化心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③ 翁贝托·艾柯著,彭淮栋译:《美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0页。

识形态主要根基于权力视角形成。正如杨念群所意识到的,审美意识形态多是“政治利益委婉曲折的表达”<sup>①</sup>,故而权力才是身体的稳定分析框架。由此看来,现代女性身体史研究似乎意味着,历史学者必须要作美学上的选择与思考,而对中国现代女性身体所作的审美诠释,也就是对中国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理性权力的再诠释和再认识。

就中国现代女性身体的“在地化”特性来看,最不容忽视的也许是中国传统女性的“闺阁”空间。在笔者看来,明清时期成为女性代称的“闺阁”空间,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身体上符合主流价值的所有话语体系和社会关系。19世纪末,“闺阁”遭遇现代话语解构,曾经集女性德行、才情、教养、地位于一体的闺阁空间,在世人眼中逐渐成为带给女性痛苦与羞辱的根源,现代女性纷纷以逃离闺阁的方式,来标榜自我的道德坚守。在现代社会,以进入公共空间为能事的女性身体话语体系,完全挤压了闺阁空间。但奇妙的是,某些闺阁情结却依旧起作用,成为对现代女性身体话语体系的某种制衡,并与其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样态。而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闺阁”空间的系谱性考察,相关话语体系的梳理,与中国现代女性身体话语体系博弈或共谋的研究都亟待展开。

中国现代女性的进步决非不言自明,她的彻底“解放”和“自由”也许只是某种现代性迷思。历史性地审视中国现代女性主体,如果认同“进步意味着生命和权力意志的提高、强化和上升”<sup>②</sup>,那么就必须通过女性身体史研究对此予以说明:社会性的“它律”,通过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传导至女性身体情感层面,进而转化成为身体“自律”,以显示出女性主体的生成性与女性身体存在的生成性同步。现实生活中,女性对当下自我的选择与把握,对未来自我的设计与追求的看重,不能不说是对上述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特征的承续。

以上所论,都有待于在对现代中国女性身体史进行潜心研究的进程中得到揭示、印证或修正。

收稿日期 2016-05-15

作者史敏,历史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124。

##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rn Chinese Female Figure

Shi Min

**Abstract:** The modern female figure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the female figure characteristic which were influenced by politics and social mechanisms. The change of female fig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usually reflects many aspects in Chinese society. It often gives much information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etc..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studies on the female figure increasingly attracts the interest of many historians.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new culture history, the western gender history and the western female figure history, some new Chinese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Certainly, there is a lone way to go for the researchers in the Chinese modern female figure history.

**Keywords:** femak body history; new culture history; discourse analysis; body politics

【责任编辑 李振宏】

① 杨念群:《中国艺术表达中的“隐喻”传统与历史写作》,《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34页。

② 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